

权力不任性了,吴海才不会“太憋屈”

如果政府公务人员每次刁难群众之后,都会受到应有的处理,就会促使他们养成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习惯。同时,吴海他们也不必因为担心来自权力的“灭顶之灾”而成为沉默的羔羊。

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北京的创业者吴海在今年3月发一封题为《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的公开信。这封信在国务院领导阅读之后得到了回应。近日,多个部委的相关负责人在中南海召开研讨会,当面听取了吴海的意见。

吴海的一句“太憋屈”说出了很多创业者的心声。公开信中不仅谈到办证难,还涉及到一些部门的腐败行为以及庸政懒政、各自为政的问题。这不仅是吴海的个人遭遇,更是很多创业者的普遍感受。这封信既是吴海的心声,也可视为时代的呐喊。各部委如何回应吴海,不仅影响到创业者“下海”的积极性,也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转型能否顺利并轨。

让吴海感到“太憋屈”的诸多问题,其实都不难找到症结,无非就是权力太任性,比如每逢节日的吃拿卡要、基层警察随心所欲的执法、不同部门之间的扯皮。如果不是一个有亲身体验的创业者,恐怕都很难相信一些政府部门至今还停留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中。毕竟,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已经推进了很长时间,本届政府关于简政放权的承诺在去年底就已经提前完成。吴海之所以感受不到简政放权的红利,是因为简政放权在传递中出现了梗阻。在地方,一些部门对“部门权力化、权力利益化”恋恋不舍,不愿意放权。如果一些部门没有了那种可以令创业者“哆嗦”的权力,也就不可能在节假日收到企业送上的“特种税”。

为推进地方简政放权的落实,中央也不乏督促行动。在不愿放又

不得不放的时候,一些部门在简政放权方面玩了数字游戏,只放了一些没油水的权力,那些有油水的权力换个马甲很快就回来了。虽然简政放权已经被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但是怎么考核是关键,如果只是被一些部门拼凑的数字牵着鼻子走,那么吴海他们的“太憋屈”就会变得“更憋屈”。所以,简政放权不能成为闭门造车的改革,必须多听取民意,只有了解了民众的“憋屈”和痛点,才能有的放矢。像吴海这样的创业者如果能更早一些被政府部门请去面议简政放权的问题,很多没有根基的创业者就会鼓起更大的勇气参与竞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也必然水涨船高。

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之前吴海没有被政府部门当做“座上宾”,只是因为没给总理写公开信吗?显然不是。在吴海看来,企业之所以屡受刁

难,是因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政府部门那里没有地位。面对权力的吃拿卡要,一个城市的几千家企业竟然无人吭声,都怕“灭顶之灾”。所以,简政放权不是简单的技术活,只靠一张权力清单也治不了吴海的“太憋屈”。政府部门必须在转变职能的同时不断转变观念,塑造与时代相适应的行政伦理和职业道德。否则,即使只有了点的权力,都可能给群众带来泰山压顶的苦闷。

所以,要彻底化解吴海他们的“憋屈”,目前急需改变的是加快简政放权在地方尤其是基层的落实,从长远看还要继续加强作风建设,加大反腐力度。如果政府公务人员每次刁难群众之后,都会受到应有的处理,就会促使他们养成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习惯。同时,吴海他们也不必因为担心来自权力的“灭顶之灾”而成为沉默的羔羊。

取消以药养医,得靠政府补“亏空”

大家谈

廖新波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工作小结和取消以药养医需协同推进2015年重点工作任务》,其中第一点就是“全面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破除以药补医机制,进一步理顺医疗服务价……”而此前印发的《关于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建立县级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也就是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理顺医疗服务价格、落实政府投入责任。

“以药补医”被诟病多年,自2012年311个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县中的299个取消15%的药品加成后,药品占医院总收入比例下降明显,但是不少院长抱怨他们亏本了。究其原因,取消以药养医后,对县级公立医院的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政府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政府补助两个渠道,但政府补助的增加不足以补偿资金缺口。即使是富裕的浙江,补偿也没有完全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医院为了生存,也就衍生出类似于“以检补医、以检补药”的医疗行为,非但没有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加重了医院和患者的负担。

在笔者看来,取消以药养医关键在子于制度,制度设计应贯穿着尊重生命与医生劳动价值的理念。而现行的“811分账制”(即取消药品15%的加成后,利益由

医保、政府、医院按8:1:1的比例消化)并不是完全的医药分离。

不妨以社会保险制度较为完善的日本和德国两国为例做个比较。日本在过去几十年持续大幅提高医生诊金,使医生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药品销售变成了医术体现。在日本,通常看普通小病诊疗费非常贵,开药却很便宜。不过,日本将99%的人口纳入国民健康保险,个人就只需承担30%的费用。孩子如参加了医保和每月1000日元的婴幼儿保险,看病吃药相当于完全免费。从中不难看出,关键在医疗保障。

再说德国,它实行医药分离制度,医院或诊所不设药房,患者看病后可拿着医生开的处方到社会药店买药,投保人支付少量的附加费即可。医保基金固定了药品的参考价,如药价超过参考价,投保人有两种选择:自付超额部分或改买其他药品。由于愿自付超额药费的投保人不多,制药公司也就较少提供价格超出参考价的药品——这就是医保定价、市场调节的机制。

对比之下,中国试图破除以药养医却不是从整个制度的有效安排下进行,单药品的管理就五花八门,什么药房托管,什么药占比,什么二次议价等等,其思维基础一直都是“以药养医”。

值得注意的是,取消以药养医,实行药品零加成,接下来还要提高服务收费,所以整体的医疗费用仍会呈现上升趋势。因为药品费用占整个医疗费用的比例在缩小,反倒是服务收费远远没有调整到合理的水平,因而后者的上涨将带来更大的影响。

要彻底使医疗费用明显下降,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按照医改新方案提出的,政府要负责公立医院的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的购置,当然还有科研经费、退休人员的费用等。后面这两项不加上去,医院的开支也很大。政府补偿若跟不上,医院也只能各显神通了。因此,如果政府投入在这些方面都能做到,那么患者支付的费用可以相应减少。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政府通过加大对医保的支付来间接补偿医院,解决医院生存的问题。何况,公立医院是体现政府办医的意志,政府理应落实投入责任。不可否认,政府每年在医保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由于制度设计的问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浪费。比如,有很多疾病在门诊是不能报销的,但只要住院,医保就能报销了,所以不管是患者还是医生,有时都会选择住院,从而造成了医保浪费。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其实,只要节约一点,政府补偿一点,患者的费用就会减少。

取消以药养医需要各项改革同时进行,如支付制度、薪酬制度、补偿机制等,不然取消以药养医只能是一句空话,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如今,《意见》已经提出各县(市)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负总责,分管负责同志要具体抓,并将改革推进情况纳入对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考核结果与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挂钩。这意味着取消以药养医的协同推进不仅落实到各级政府,更落实到人。(作者为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

媒体视点

慎对电商征税

别只考虑“增收”

对电子商务是否征税,如何征税,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前些年各地税收大幅增长,税务机关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今年全国税收尤其地方税收遇到分税制后二十多年从未遇到的严峻局面,政府将目光转向电子商务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从现在开始清理电商税收,当然也是税收机关的职权所在。但是,是不是从现在开始,把电商作为税收增长点,进行从前的清查、评估和征收甚至补征,则需要进行认真的权衡。

第一个权衡,就是税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权衡。税收从来就不仅仅是为了取得财政收入,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学派,都注意到税收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如果对于电商的征税引发电商业的危机,影响就业,那么,何妨在税收上暂且从宽?

另一个权衡,是征收成本的权衡。税务机关如果要对大量的经营者逐一核实,确定其营业额和收入是否达到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并对其进行建账评定,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征收的成本高而所得少,这是十年前中国最终放弃农业税的一个重要原因。

电商照章纳税,在理论上法律上都无疑义和障碍,问题只在具体操作的政策考量。是要长远的利益,还是眼前的利益,是要包括经营者利益在内的全面的利益,还是仅仅保证政府收入这一块利益。这些利益摆平了,那么,对于电商的税收就有办法了。(摘自《中国经营报》,作者梁发芾)

建设“立体化”新城

政府需“退居二线”

由于城市发展方式创新的滞后和过度追求物理空间形象的政绩观导向,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中逆集约化现象日益突出。一方面是城镇化面临土地缺口,另一方面是土地利用普遍存在的低效、闲置情况。正因如此,诞生于新加坡的集约型立体城市模式受到广泛关注。

实施立体城市模式的关键,在于根据城市功能板块的需求,统筹布局、集约运营城市各类资源。通过竖向发展、大疏大密、产城一体、资源集约、绿色交通、智慧管理等规划发展,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改善城市低密度分散化倾向,提升城市密集度,提高城市土地使用效率。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立体城市的开发主体主要是城市运营商,在城市总规、详规、绿规等框架下,在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督下,由城市运营企业统筹整合各类生产生活功能资源,其结果不仅更加贴近城市居民需求,而且成本低、效率高。只有大胆创新政务方式,把市场主体可以完成的建设、招商、运营等工作交给市场,城市政府才能集中力量做好环境保护、市场秩序维护、公共卫生、知识产权保护等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本职工作。(摘自《经济日报》,作者张毅)

本版投稿邮箱: qilupinglun@sina.com

公民论坛

工资发了再退,谁在给何灵添“麻烦”

余明辉

何灵被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职工质疑吃空饷的事件最近引起不小的波澜。何灵通过微博回应称,从2007年起自己的工资都是返还学校的,自己没有拿过一分钱,为让学校免于争议,表示愿意离开。而北京外国语大学也发声,称同意何灵辞职。(5月18日《京华时报》)

按说,有举报、有回应,事情到此似乎也该了结。但何灵一句“从2007年起自己的工资都是返还学校的,自己没有拿过一分钱”,无意间又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未竟之问。

众所周知,一般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其形成的路线图是:当事单位提出申请,劳动人事部门凭借机构编制部门的编制名册按规定为每位在编人员造工资数额并批复到当事单位,然后当事单位凭借劳动人事部门的批复,向财政部门申请拨付人员工资,财政部门根据劳动人事部门的批复和当事单位的申请决定拨款数额,然后各单位再把工资打进个人工资卡。

也就是说,在这几个环节中,但凡有一个环节的负责人切实履行了职责,就不会有“吃空饷”人员的存在。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此次“吃空饷”事件中,北

外和何灵都承认,何灵从2007年就主要不再从事学校教学工作,并退还财政所发工资,“没领过一分钱”。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发了又要退还,校方为何这么长时间以来还继续为其发工资;至于退还的这部分工资,又到底去了哪里?

长期以来,“吃空饷”之所以屡见不鲜,甚至愈演愈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关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疏于本职工作。现在,何灵北外辞职了,就其“吃空饷”问题本身而言可以暂告一段落,但由此牵扯出的失职失察问题,以及可能的腐败问题,还需要有关方面审查细究。



本报地址 济南泺源大街2号

邮编 250014

传真 (0531) 86993336 86991208

报纸发行 (0531) 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 (0531) 82963166 82963188 82963199

差错投诉 96706

发行投诉 (0531) 85196528

邮政投递投诉 11185

即时互动平台



“壹点”官方APP



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qlwb



齐鲁晚报微信 qiluwanbao002



读者服务中心 96706 www.ql96706.com